

傅斯年与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历程考述

Fu Ssu-nien and the Transfer of Jurisdiction of the Museum of History in Peiping

辛迪¹ 李守义²

Xin Di¹ Li Shouyi²

(1. 中国书店出版社, 北京, 100050; 2.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1. Cathay Bookshop Publishhouse, Beijing, 100050; 2.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内容提要: 傅斯年在民国学界是一位既能从事学术研究, 又有能力组织学术活动及进行行政管理的多面手, 堪称“学术精英群体聚合的纽带性人物”。1929年8月, 在傅斯年的推动下, 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期间的有关史料, 对傅斯年推动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并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组建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调整历史博物馆由中央研究院直接管理的史实进行了钩沉, 揭示时局动荡下, 傅斯年在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 历史博物馆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

Abstract: Fu Ssu-nien was not only an expert in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a good hand in organizing and administrating academic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known as “the all-arounder in the academic elite group”. In August 1929, when he was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he pushed the transfer of jurisdiction of the Museum of History to the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regarding this transfer, the museum’s administration implemented b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he formation of the Academia Sinica History Museum preparatory office, and the later adjustment which put the museum under the direct management of the Academia Sinica, to summarize Fu Ssu-nien’s role and his contribution in museum’s development at turbulent times.

Key Words: Museum of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Fu Ssu-nien

1912年7月, 以“搜集历代文物, 增进社会教育”^①为宗旨的历史博物馆

成立于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历史博物馆^①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筹建, 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建并直接管

① 民国时期, 历史博物馆几易其名, 1912年7月9日成立时称“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1920年11月更名为“历史博物馆”, 1927年8月更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 1929年8月13日, 国立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 定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1936年7月, 历史博物馆正式划归中央博物院, 定名“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本文为行文方便, 统称历史博物馆。



图1 1930年3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免费开放学校团体来馆之景况



图2 傅斯年

理的国家博物馆。因其官方属性，又因生处民国时局动荡时期，历史博物馆一路磕磕绊绊、风雨飘摇。1918年，馆址由国子监迁往故宫端门、午门；自1926年10月10日始正式开放，接待公众。1929年8月划归中央研究院，此后直到1936年7月由中央博物院管理前，历史博物馆均由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也因此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和改变（图1）。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图2）。在民国学界，傅斯年是一位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有能力组织学术活动及进行行政管理的多面手，堪称“学术精英群体聚合的纽带性人物”^[2]。胡适称赞其“是第一流做学问好手，而又能组织，能治事”，“能做领袖人物，而又能细心办琐事”^[3]。傅斯年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接推动了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并组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对困难时期的历史博物馆的发展给予了积极与必要的支持。

一、推动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并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

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为院长。同年，受蔡元培之邀，傅斯年、顾颉刚等人负责筹建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第二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开始彪炳千秋的学术研究工作。

此时的历史博物馆虽然于1926年正式向公众开放后，各方人士参观指导络绎不绝，也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但此后因隶属关系不断变化，主管部门多次变更^①，特别是博物馆开办经费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严重制约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在此期间，博物馆各项工作规划处于暂时停顿的状态。

1929年8月初，傅斯年代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向中央研究院致函，建议将历史博物馆划归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认为：“北平之历史博物馆，藏物颇有根基，可据之以成大规模之博物馆，只以限于经费，未能多能（聘）整理研究（之）人。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乏专家从事整理之业，只以自无材料，亦感创始之难。若将历史博物馆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则以彼材料，用此人力，必感相得益彰之效，不特旧物得适当之保存、整理与刊布，而历史研究所以后历年所获，尽以增益，此博物馆亦可日益发达。历史博物馆必有整理之人，历史研究所亦日获新出之具，合之两美，离之两伤。”^[4]并承诺，“敝所必于一年之内，将历史博物

① 1928年6月，历史博物馆由教育部划归中华民国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1929年6月，历史博物馆又隶属教育部。

馆整理完备，刊行图影目录，以不负教育部之盛意”^[4]。中央研究院收到函后，认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陈各节，确系实情”，“于吾国历史学术之学达，当有裨益”^[4]。便立即致函教育部，希望获得教育部的支持。教育部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8月7日，教育部第七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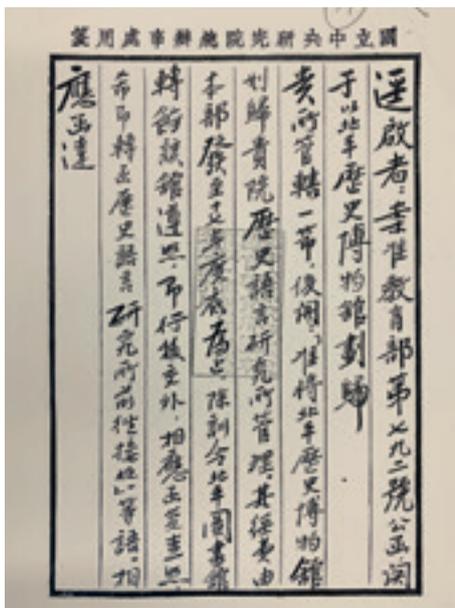


图3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给历史语言研究所函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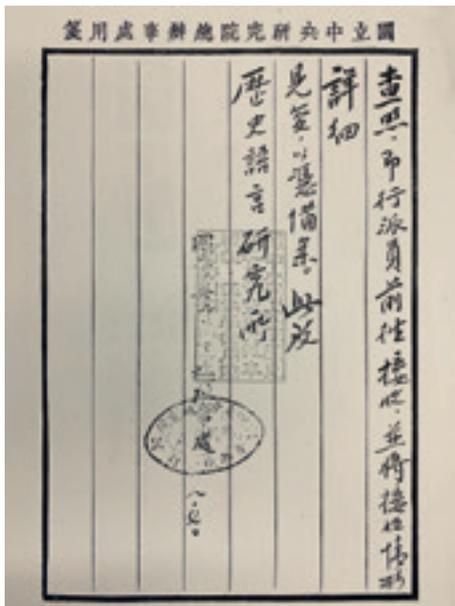


图4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给历史语言研究所函2

号公函，同意“将北平历史博物馆划归贵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管理。……除训令北平图书馆^①转饬该馆遵照即行移交外，相应函复查照，希即转函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往接收”^[5]（图3、图4）。

在收到教育部的公函后，中央研究院于当日即要求历史语言研究所即行派员前往接收，并将接收情形详细汇报以做准备。8月10日左右，教育部再次致电中央研究院，催促其尽快完成接收工作。“顷准该所傅斯年先生支电，内开接收史馆（历史博物馆）公事，至今未到，盼即寄下，至盼并复等由到部。”^[6]为此，蔡元培专门致电傅斯年，要其加快接收进程。

同时，历史博物馆也收到了教育部第一零二二号“准将北平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管理”的训令，8月12日，历史博物馆致函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在业将交代手续准备完竣，敬希贵所派员，于明日（十三日）上午莅馆接收”^[7]。

1929年8月13日，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员完成了对历史博物馆的接收。至此，在傅斯年的直接推动下，历史博物馆正式划归中央研究院。划归后，成立筹备委员会，相关人员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进行聘任，具体事务工作则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最早成立的几个研究所之一，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罗常培、李方桂、董作宾等，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傅斯年任职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多年里，他的把史学研究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治学主张和办所方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这里所讲的史料，不仅是史籍，“应当扩大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例如地下材料的彝器、甲骨、简牍、明器、敦煌卷子、档案，以及从人类学调查得来的资料”。1929年3月，在傅斯年的大力奔走下，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以一万八千元的价格由李盛铎手中购入1921年由历史博物馆流向民间的内阁大库档案。档案购入后，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徐中舒负责接收，存于历史博物馆。《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事务报告》记载：“本所所购明清档案，半存北平，半存天津。其在平者，已于上月底运存于历史博物馆午门城上。其在津者，本月3日由编辑员徐中舒率同书记尹焕章前往移运，计装二千七百麻袋，四十一箱，四十三席包，于14日抵平，随于15、16两日

① 1929年6月，历史博物馆改由教育部直辖，其间一度交国立北平图书馆代管。

运存午门楼上。于是此两部分档案，始得合度一处。”^[8]傅斯年极为重视这批内阁大库档案，他在致蔡元培的函中写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名誉之事也。”^[9]除了这批流散于民间的，还有大量内阁大库档案留存于历史博物馆。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载：“按本馆旧存是项档案，计已经编号者清代贺表三箱，共三千三百二十五件，清代敕谕九箱，共二千一百零二件，明清各项重要文件五百八十二件，除本馆现陈一百零五件，其余四百七十七件共装一箱，并检同原有编号簿十本，又未编号贺表一箱，题本一箱，及十八年八月打扫端门洞扫出破碎档案纸片四麻袋，约共万件。”^[10]此外，还有清太上皇帝起居注册若干本，由嘉庆元年春起迄是年冬止，陈列号数为二七二二。将这些分散各处的同属内阁大库档案的历史资料统一规划管理，是傅斯年最先着手解决的问题。在给教育部的致函中，傅斯年说：“历史研究所近以二万元购李氏所有之明清内阁档案，实与历史博物馆藏者为一事，后乃无端分为二宗。分别整理，颇感不便；合为一起，事半功倍”，“至于档案，亦于拨到之后，即行编辑”^[4]。同时，傅斯年认为：“博物馆之发达，端赖专门学者之整理，历年不断之增益，研究结果之报告，精编目录之刊行，盖保存之中，寓有研究；研究之果，在于著述，此通谊也。”^[4]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及傅斯年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理想下，傅斯年着手推动了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一事。

二、组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后，傅斯年开始负责历史博物馆组织的重构工作。关于历史博物馆的管理问题，早在1929年7月，傅斯年曾与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进行过沟通，傅斯年提出，历史博物馆交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用人行政，教部概不过问”^[11]，并得到了其支持。

傅斯年首先聘任原历史博物馆主任裘善元，负责馆中管理事务。

裘善元（1890—1944），字子元，浙江绍兴人，在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之前任历史博物馆主任。裘善元在历史博物馆供职时间较长，曾参与了历史博物馆1921年在河北巨鹿故城的发掘、1924年河南信阳擂鼓台及王坟洼汉冢的发掘、1926年湖北枝江古冢的发掘，以及多次的古物调查工作，对历史博物馆的工作较为熟悉。

1929年8月，傅斯年致信裘善元，说明中央研究院接收历史博物馆的目的是“意在维持旧有，并扩张各项之设计，以求进步”^[12]，以裘善元“热心馆事，成绩昭然”，邀请其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兼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事务主任，负责管理博物馆的具体工作。

8月18日，傅斯年致信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铨，与其沟通历史博物馆组织筹备情况。傅斯年在信中写道：

弟连日大忙，忙到乱七八糟。所忙者大略可分为下列数事：

一、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之组织。[行首自注：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傅斯年、陈寅恪、李济（*ex officio*）、朱逸先（主任）、裘善元、董作宾、徐中舒。其中常务委员三人：朱（主任）、裘（管理）、傅（编辑）。]

此事大致已就绪，下周内有一详细之公式报告。月费五百中以一百津贴朱（朱希祖），因他代史研所购书及编辑档案等也。裘子元（名善元）如其原薪（一百五十），用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名义加入此会中，其余二百五十，请他节至一百五十，月余一百作添补之用。

如兄以此办法为然，即请发表。[行首杨铨批示：请发表（发聘书）]

裘子元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兼历史博物馆筹备

处事务主任。

弟已将裘（善元）君之名列入史言所职员录中，如兄有异议，请通知京办事处更改。〔行首杨铨批示：无异议。〕^[13]

同日，杨铨批准了裘善元的任职。

9月29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召开所务会，讨论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组建事宜。会议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明确历史博物馆名称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暂代中央研究院管理一年”，一年后由中央研究院直接管理；二是组织筹备委员会，委员由社会知名学者担任，傅斯年、陈寅恪、李济为当然委员，朱希祖为委员长，裘善元、董作宾、徐中舒为委员，并以朱希祖、裘善元、傅斯年为常务委员，裘（善元）任管理，傅（斯年）任编辑^[14]（图5）。

这样，在傅斯年的积极推动下，历史博物馆完成了重新组建，开始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名义开展工作。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展览、文物征集、社会教育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1929年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对常设展览进行了改陈，将午门楼上第八、九、十陈列室三楹（即西翼楼及西南亭）腾空器物，借拨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清理档案工作；将与历史博物馆性质稍嫌宽泛的意大利捐赠飞机及有关教育类的标本二项，移送相关机构保管陈列；其他物品，则分门别类，重新布展，新的常设展共六个展览室，分别陈列出土发掘品、金玉、石刻、石窟壁画照片、明清档案、周代彝器及兵刑器物等。在常设展的基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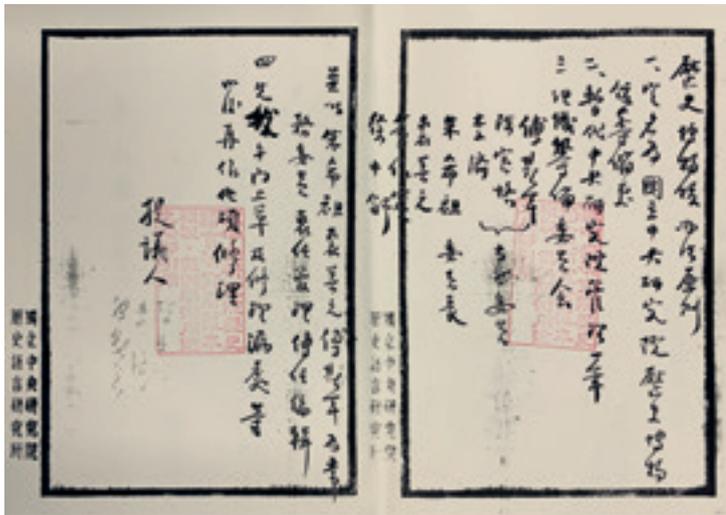


图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9月29日所务会议提案

历史博物馆还不时开办一些临时展览，如为筹款抗日，历史博物馆联合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自1932年3月18日起“联合开放三天，售券筹款，全数充作慰劳前方将士之用”^[15]；为激发民众爱国热情，1932年6月18日至26日举办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其目的即为：当此国难日亟，东北傀儡登场，洪氏人格事迹颇有其相当刺激性，为供国人鉴戒计，特检集馆藏史料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作有系统之陈览^[16]。在文物征集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除请教育部致函各省区广泛征集古物外，还有目的地系统征集了北京各城区的明清铁炮及历代印章关防，极大增强了馆藏数量与质量，如1930年，历史博物馆在社会各方面通力协助下，共收藏铁炮一千二百余尊，其中铸有天启、崇祯年号以及“神机”“神枢营司”字样的明炮占十之八九，余则多为清末遗物。1931年春，历史博物馆以半捐半售方法（费资六百元），收藏意大利使馆参赞罗斯所藏各种徽章、纪念章千余件，并在此基础上加意搜求，以期建立更为全面、系统的徽章纪念章藏品体系。这一时期，历史博物馆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参观管理制度，使用的票券大致有四种：一为不定期赠券，二为定期赠券，三为普通参观券，四为半价券。其中不定期赠券按月分赠各学术团体、文化机关，开馆例日，持券来馆，可随时入览。定期赠券则在票券上印明参观日期，持票者需在指定日期到馆参观。这一类赠票自1930年3月起发放，主要分赠各机关各团体，目的是使更广泛的普通民众能获得参观机会。普通参观券每券收费一角，与之相辅的是半价券，每券五分，这种票面多发售于纪念日、节日特别开馆时，主要目的也是吸引更多的普通民众走进博物馆。

三、调整历史博物馆代管模式， 建议由中央研究院直接管理

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档案看，在接管历史博物馆初期，傅斯年对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并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态度十分积极，中央研究院致教育部“请将历史博物馆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公函，甚至都是他代笔的，他对历史博物馆之后的发展也有“扩张各项之设计，以求进步”的愿景。然而两年后，傅斯年对历史博物馆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建议将历史博物馆交由中央研究院直接管理，历史语言研究所不再代管。

1931年7月，傅斯年主持召开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会议，议决取消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由中央研究院直轄。傅斯年在呈蔡元培的公文中写道：

当时同人讨论此事时，以为此项委员会之组织，不过暂时的，以后应由院直轄，故定明一年为期。不幸去夏北平逆军叛变，本所虽未受其干涉，而日在忧患中，故无形延长一年。今又届年度改换，当由本月一日开常务会议，出席人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君及斯年。议决根据迁平后第三次所务会议议决，本年度应即取消，由院直轄。相应呈请院长查核。至以后如何办理，亦请院长决定。^[14]

然而，傅斯年的请求并未获得中央研究院的支持。7月18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批示“仍由筹备委员会继续管理”^[17]。

8月中旬，历史语言研究所召开所务会议，讨论缩减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人员名额，“以专责成”，会议决议“设委员五人，当即推举李济为委员长，陈寅恪、裘善元、董作宾、徐中舒为委员”^[18]。8月20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将“继续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办法推定委员五人”的会议决议^[18]报呈中央研究院鉴核备案。8月27日，中央研究院批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调整方案。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北平市乃至整个华北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1932年上半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启动迁往上海的工作^①。1932年6月29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召开所务会议，再次提议将历史博物馆交由中央研究院直接管理，并陈述三条理由：“不如此不能增费；不如此不易发展；本所照顾有时不周。”^[19]（图6）然而，傅斯年的建议仍未得到中央研究院的支持。

1933年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名义上归教育部管辖，实际上由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合力筹备，筹备主任即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兼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管理主任裘善元亦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干事。

1934年6月2日，傅斯年以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有待决之关系”，专门呈文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决定解散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所有委员不再续聘。“本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委员会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职员兼任之，所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职员续职、续任名单，业已上呈。此项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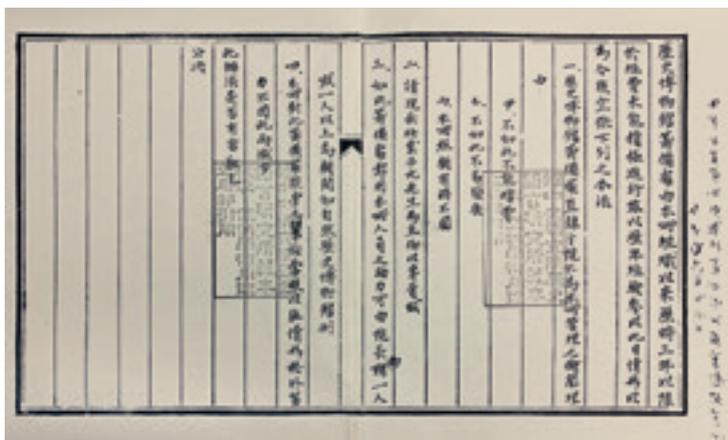


图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6月29日会议提案

① 现常见说法，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迁上海。而傅斯年1932年4月12日给徐韦曼的信中即有“而历史语言研究所因迁居上海之故，弄得一蹶（塌）糊涂”等语。信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下署日期为“四月十二日”，而徐韦曼回函签条所署日期为“民国廿一年四月十五日”，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搬迁工作至晚在1932年4月即已启动。1934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又由上海迁至南京北极阁东麓，1936年迁鸡鸣寺办公。

员会组织因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有待决之关系，拟暂不呈请聘任其职务，因皆历史语言研究所中闻事执行，不虞停顿。”^[20]至此，历史博物馆的日常管理工作由裴善元在南京“遥领”。

1936年7月后，历史博物馆正式划归中央博物院，由中央博物院行使管理权并拨转经费，定名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结束了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的历史。有关划归情况，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九年来筹备经过简要报告》中写道：“中央研究院以二十五年度本院（中央博物院）当可正式成立，该馆（历史博物馆）有归并必要，特于二十四年十一月致函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声明自二十五年度起，该馆经费改由本院支付，筹备处据函向教育部请示，奉准自二十五年七月实行接受合并。”^[21]

分析傅斯年不愿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代管历史博物馆的原因，全因历史博物馆的发展经费难以解决。历史博物馆自1912年7月筹备以来，教育部规定其经费“每月千元，并按年另拨临时费八千元，作为临时修缮、购置、调查、发掘等用”^[22]。后因时局动荡，经常出现主管部门拖延不付的情况。1929年6月，

“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收管辖后，规定馆费每月三千五百元，但须提交预算委员会通过后，始能由国库付给。在正式预算未经成立以前，按月由部费内抽拨五百元，为本馆维持费用”^[22]。1929年8月12日，教育部同意“将北平历史博物馆划归贵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管理”时，对于经费的拨付明确表明“其经费由本部（教育部）发至十七年度（1928年）底为止”^[7]，以后经费则由中央研究院负担。

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也曾让博物馆工作人员一度认为博物馆迎来了发展的曙光。在傅斯年的授意下，博物馆工作人员制作了1929年度预算表（图7），其开列的包含薪资、事业、事务、杂费四目的详细预算，年度经费提高到四万二千元，月均三千五百元，比之前实际拨付费用提高了6倍。在预算书后附有经费使用相关说明，强调“本馆为华北文化机关，事业至关重要。上列各款均系斟酌列年开支情形，暨此后实际必不可缓少用途，撙节开列，以期款不虚糜，事无停滞”^[23]。可以看出，历史博物馆大有欲在中央研究院支持下一展宏图之势。然而，预期的美好与现实的实际情况有着巨大的落差，历史博物馆的预算并没有获得中央研究院审核通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认为，历史博物馆“其原有数似为每月五百元，与本年增加数相差过多”，要求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其“查照审核，另行开列”^[23]（图8）。此后至1936年7月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实际按月支取的经常费仍只有五百元，甚至一度低至四百元^[24]。

经费问题极大地制约了历史博物馆的发展。1932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务会议中承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由本所组织以来，历时三年，以限于经费，未能积极进行”。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只能“以最少之经费，及苦极之待遇”，勉力

历史博物馆1929年度预算表	
第一月办公	六百元
第二月办公	六百元
第三月办公	六百元
第四月办公	六百元
第五月办公	六百元
第六月办公	六百元
第七月办公	六百元
第八月办公	六百元
第九月办公	六百元
第十月办公	六百元
第十一月办公	六百元
第十二月办公	六百元
全年办公	七千二百元
全年薪工	三千元
全年杂费	一千二百元
全年事业	一千二百元
全年总计	四万二千元

图7 历史博物馆1929年度预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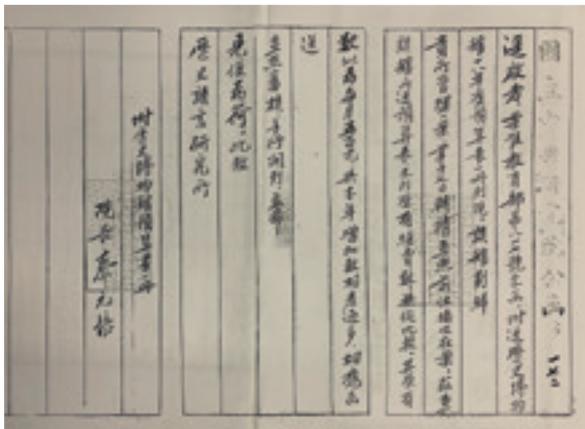


图8 蔡元培致历史语言研究所函

“维持其保守、整理、阅览，并相当进步及研究之工作”^[25]。傅斯年的怅然之情溢于言表。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历史博物馆因时局动荡，在划归中央研究院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管之前，隶属关系几经变更，各项工作一度陷入停顿。在傅斯年的推动

下，历史博物馆并入中央研究院，合并的初衷便是利用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家，“以彼材料，用此人力”，使历史语言研究所尽以增益，博物馆亦可日益发达，“合之两美”。在实施过程中，确实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定目标，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就是两个机构合作的典范^[26]。同时，历史博物馆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家的带领下，整理了大量的馆藏文献，如清代历朝殿试卷的整理，王静如对西夏印文的考订，董作宾对甲骨文字的考订等^[27]。总之，傅斯年充分发挥了其既擅于学术研究又擅于行政管理的多面手特长，对这一时期历史博物馆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规程(1927-10-15) [A].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283.
- [2]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序言[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1.
- [3] 胡适. 关于傅孟真先生生平的报告[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5.
- [4] 中央研究院致教育部函: 请将历史博物馆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 281-2.
- [5]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给历史语言研究所函[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 281-7b.
- [6] 蔡元培致傅斯年电[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 281-6b.
- [7] 教育部北平历史博物馆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函[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 281-9b.
- [8] 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事务报告[M]. 傅斯年全集: 第六卷,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50.
- [9] 傅斯年致蔡元培函[M].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 第5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85-286.
- [10]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M]. 傅斯年全集: 第六卷,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92.
- [11] 傅斯年致蒋梦麟函[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 281-1b.
- [12] 傅斯年致袁善元函[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 79-2.
- [13] 傅斯年致杨铨函[A]. 第二历史档案馆, 档案号393-0-0421-02-pp. 61-63. 转引自王汎森, 潘光哲, 吴政上. 傅斯年遗札: 第一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59-160.
- [14] 呈为本所常务会议决取消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 由院直辖由[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 282-5.
- [15] 平故物机关明日起开放三日, 明清秘物均择要展览, 所收票价悉汇沪劳军[N]. 大公报, 1932-03-17(5).
- [16]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年度报告[M]. 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 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 第四册. 北平: 国立中央研究院, 1931.
- [17] 总办事处给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件[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 282-6b.
- [18] 呈继续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办法推定委员五人, 请备案并发聘书[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282-8.
- [19]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次所务会议提案[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 282-10.
- [20] 傅斯年、李济致蔡元培函: 申述暂不呈请聘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委员由[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杂2-18-3-5.
- [21] 李济.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九年来筹备经过简要报告(1941-10). 转引自刘鼎铭.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J]. 民国档案, 2008(2).
- [22] 关于历史博物馆十九年度预算情况的函[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 283-4b.
- [23] 蔡元培致历史语言研究所函[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283-16.
- [24] 傅斯年1932年11月与杨杏佛信[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287-5.
- [25] 傅斯年1932年11月1日给杨铨、王敬礼的信[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档案号元287-5.
- [26] 李守义. 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播迁纪略[J]. 紫禁城, 2012(2).
- [27]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九年度报告[M]. 傅斯年全集: 第六卷,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269.